

China's Gentry

中国士绅

费孝通 著

赵旭东 秦志杰 译

-24

China's Gentry

中国士绅

费孝通 著

赵旭东 秦志杰 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D681.7

F376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士绅/ 费孝通著; 赵旭东, 秦志杰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12

ISBN 978-7-108-02694-1

I. 中… II. ①费…②赵…③秦… III. 绅士-研究-中国-古代 IV. D69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5239 号

责任编辑 薛松奎

封面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8.75

字 数 170 千字

印 数 0,001 - 8,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说 明

本书主要论及城乡关系问题，并涉及六个中国士绅家庭的生活史。这些生活史由周荣德搜集整理。本书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雷德斐尔德（Robert Redfield）作序。玛格丽特·帕克·雷德斐尔德（Margaret Park Redfield）对本书做了修改和编辑。

这七篇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论文，是以费孝通先生在1947—1948年间发表在中国报纸上的文章为基础。另外附加的六篇则是有关中国士绅的生活史。这些生活史是周荣德先生1943—1946年间在云南地区所从事的有关中国士绅研究的一些片段，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费孝通先生在阐述这一问题时的洞见。

本书的主要影响力和魅力在于它并不只是面向西方的读者，这里的每一篇论文都可以说是一位博学的中国人以中文形式为中国公众所写下的。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斯宾瑟（Robert F.

Spencer) 对此书有这样的评价：“……雷德斐尔德夫人为准备将此书译介给美国读者而做的缜密研究应该受到赞誉。”而许烺光 (Francis L.k.Hsu) 教授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称赞道：“……这些文章不能被任何一个研究中国士绅的学者所忽视，六部生活史也毫不逊色。这些士绅中有文人、军人、官僚、商人、土匪和改革家。”

在本书 1953 年出版之时，中国国内的形势使得学者与海外的交流出现阻隔，所以正如出版这本书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所说的：“由于出版商多年未与费先生联络，因此无从得知他是否要对此书进行某些修改。考虑到此书深远而持久的研究价值，并应读者的不断要求，本出版方决定将此书原版重印。”《中国士绅》这本书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出版的。

译者

谨献给保拉和杰克，

因为他们是我的好朋友，还因为我在致辞里面已经把家人的
名额都给用完了。

谨献给所有的评论家，

因为只有不领情的人才会在得到本书的题献之后还抨击它。

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

费孝通

我昨天刚刚从江苏回到北京，在家乡跑了一个多月，没有能很好地准备这一次讲话。在车上我想了一下，决定就讲一讲我自己研究农村的经过。我的话还是以家乡话为主，有些同志可能不一定听得懂，不过会录音记录下来，整理出来可以再看。

我所讲的题目是《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这就是要讲我自己怎么样进入到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中的，也就是要讲我自己的学术自传。我的话就从1930年到了未名湖畔开始讲起。

我从东吴大学转学到燕京大学是在1930年秋季，那时候我只有20岁，与现在在座的各位年纪差不多。我是1910年出生的。一转眼已经有几十年了，到今年我已经快90岁了。在这70年的过程里面，我经过了风风雨雨，今天与大家来讲讲我是怎样

度过这 70 年的，怎样进入到农村调查的学术领域，我有什么体会。

我不讲我自己的历史，而是讲我自己思想发展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我对于中国农村的认识过程，讲到现在我在这方面研究些什么问题。也就是说从以前的小伙子，到今天的老头子，在这 70 年的时间中，我的思想是怎么变动的。但这个题目还是很广，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恐怕讲不完，我只能限定在一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问题是讲我为什么要挑这么一个农村和农民问题来研究，也就是我挑定研究对象的问题。一个人的思想活动，往往都是由时代决定的。我是辛亥革命前一年出生的，因而我还算是清朝的遗民，是曾属于清朝的人，我的哥哥就拖过辫子。我是从一个封建王朝，经历了将近 40 年才进入现在的人民中国。

我在 1930 年 20 岁时，才到未名湖畔来学习的。这年秋季我从苏州东吴大学的“医预科”转入燕京大学，我进大学时是想学点知识，帮助人解决痛苦。到了 1930 年，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那一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大转弯的年代，刚经过国民党的北伐军跟北方的军阀打仗的时期，即所谓军阀混战时期。在那个革命的时代里，我进入了大学。碰到了革命时期的开始，很多同我一样年纪的人被杀掉了。我当时的很多同学现在都碰不到了。前些日子我还想找一找过去的老同学，都是 90 岁上下的人了，想找他们谈一谈，谈谈我们当时青年人的思想，因为只有我们还记得，你们现在是不会碰到这样一个局面了，所以也

不容易理解当时我们这些青年人的经历。当时对于青年人来说，“亡国”是一个很具体的可能，那个时候大家都想“救亡”，“亡国奴”做不得！你们不会知道，也不容易理会。那个时候的青年人的心里很清楚，就是不能当“亡国奴”。那怎么才能不当“亡国奴”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那时是在东吴大学，那是个教会学校。我在东吴大学上了两年学，进了医预科，主要学的是生物学，目的是治病救人。经过了大革命，事情变得很清楚了，当时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两个人生病的问题，而是会不会亡国的问题。这个问题从30年代开始已经很清楚了。我恰是在这个时候来到未名湖畔的燕园，带着这个心情想要了解中国，进而来救中国，目的是不要亡国。这种心情当然不是你们现在的心情，而是我们当时的心情。要不亡国，我们自己能够做点什么事情？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面出来的人，经历了“五四”运动，相信科学救国。我们希望的是从了解中国的问题上面，能够找出一条出路来。这是当时时代赋予我们青年人的一种理想和向往。这一切的思想活动都是和一定的历史时代联系在一起的，现在的时代与那个时代相差就很远了。我们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亡国。因为在我们叫做帝国主义的时代，列强从四面八方进逼我们，将各种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了我们头上，那是一个国耻时代！当时青年人的感情很激愤，民族意识非常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到了燕京大学，决定不念自然科学了，下了决心要研究中国的社会。因为“五四”运动不是讲科学救国

吗？我们要从科学道路上面来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是怎么样，为什么到今天我们会碰到这么一个危机。那个时候，燕京大学就在现在的北大这里，我就进入了社会学系，这个时候社会学的情况怎么样呢？当时我们一般都是用英文上课的，1930年我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时候，系里面有一位先生叫吴文藻，他不但用中文讲课，讲北京话，而且还提出了社会学要中国化，要研究中国，就要用我们的科学知识来了解中国的社会。就是我初进燕京大学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学正在酝酿走这样的一条路子：就是要用我们社会科学的知识、方法来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来改造它，找出一条出路，使得我们不至于走上亡国的道路。这是我在像你们这样一个年纪的时候所碰到的问题。当时我们下决心在学术方面做出我们的贡献。

我在燕京大学念了三年，三年里面就以为自己找到一条路子了，就是社会学要走上中国化的道路，要我们青年人带头下乡去研究中国社会。为什么要下乡呢？因为我们中国人中最多的是农民，这一点大家也清楚，不用我在这里多讲了。我们要认识中国，就要认识我们中国的农民生活。这个时候认识农民生活的问题就提出来了。但是还没有具体研究，只是口头上这么讲，觉得应该这样子做。我有好几个同学下农村了，不过现在活着的已经没有了。其中有一个是同我一起的杨庆堃，曾在美国教书，匹兹堡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恢复社会学时我曾请他到中国来帮助我们重建社会学。他现在还活着，可是脑筋已经不行了，听说最

近已经得了痴呆症了，不能讲课了。（杨教授是1999年1月10日逝世的，费老此次演讲时还不知道——整理者注）

还有一位也是我的同学叫廖太初，他就住在中关村，他主要是研究农村的私塾，到山东去做调查的，这两个我都记得很清楚，现在还在，都是90岁的人了，我当时算年轻的一个。

我们这些年轻人开始就跟着吴文藻老师，吴文藻老师指出了这条路子，可是他自己没有下去调查。我们这批年轻人不管怎么样就下去调查了，看中国农民是怎么生活的。这个方法就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即 empiricism（经验主义），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获取知识。去年北大100周年校庆时，我出了一本书，名叫《从实求知录》，“从实求知”这四个字就是指从实际出发求得知识。我们要从实际出发，看农民是怎么生活的，理解农民为什么这么生活。这个道理是“五四”运动喊出来的科学和民主这两个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精华。“五四”这套想法是从美国来的，是从杜威（他当时是我们崇拜的一个人物）开始，他说的是我们的知识问题，我们从哪里去找知识的呢？要从实际里面去找，不要空谈，不要光用脑筋去想，想出许多花样来，那个不行。要去看，而且还要用科学方法去看，自己看，别人看，最后再来讨论对不对。这样的方法开辟了中国社会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科学精神。这一点我们还要归功于“五四”运动的时候这一批比我还要早一代的学者。

那么，到了我这一代呢，就要去实践了，要真的去做，真的

下乡，去看农民是怎么生活，并试图把所看到的東西系统化、理论化，那个时候我们的出发点就在于此。可是我不是农民，家里面没有种过田。我的父亲是知识分子，搞教育的，是一位老师，我的妈妈当时很摩登，毕业于上海的一所女校。现在这个学校不知道怎么样了。这所学校是一所新式学校，她的头发，不像现在的烫发，70年前时髦的妇女所梳的头是日本式，上边一个结，两边分开来。同现在不一样了，变化了！她教育出来的孩子们不让他们走上旧的道路，而是要走上新道路。当时不叫现代化，而叫新法或新学。

我们当时追求的是能不能够用科学方法找到一条比较符合实际的社会发展道路。这是我一生的追求，到现在还没有改变。变很难，总的观念问题，出发点，我们这一代人想把自己投身到学术里面去，寻求爱国救国的道路，这样的观念一生没有变。就是想用科学的知识来救国，那是当时帝国主义压迫出来的，我们做得很具体，我们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走上了社会学中国化这条路。

这条路是我的老师吴文藻先生首先提出来的。关于这条道路我还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其中讲到我们在燕京大学请了两个外国教授，一个是美国的，芝加哥大学的，叫派克（Robert Park）；另一个是英国的，叫拉德克里夫—布朗，后来我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过世后，他就成了英国人类学的带头人了。他们两个都主张社会学同人类学相结合。人类学就是用参与观察的方法来研究人

们的实际生活的。他们上一代的人类学者还是讲理论、讲猜想的，还是用演绎法来解决问题的。我的上一代老师，特别是我自己跟着他做研究生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有相当长的时间就是生活在当时被称为野蛮人，也就是殖民地的土人中间，研究他们的生活，后来写了很多的书出来，奠定了用实际调查方法体验生活，并将此看成是作为一种真正认识社会生活的方法。他们是我的上一辈，现在都不在了。我讲到过的那几个老师都过去了。轮到我还没过去，不过又是一代人了。对你们来讲，可以说是早了一代。因为你们出生的时代，你们早年碰到的生活，就不是我早年所碰到的生活，已经变了样了。中国的社会在这中间有个很大变化。这是第一段，我交代一下我为什么研究农村的农民生活，为什么农民生活会成为我的研究对象。

我们所用的方法就是实地去看，实际去体会农民的生活。可是我并不是农民，我早年并没有真正接触过农民，也没有种过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强迫我去种田了，种了两年田，种棉花。这很重要，因为真正同农民一起生活，所说的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做到了。真正做到了同吃、同住、同劳动，主要还是我们在干校时下放到村里跟农民一起种田、种棉花的经验。我现在还懂得怎么种棉花，当然已经变化不少了。像我们以前那样育秧，现在没有了。利用种子放在土里面让它长出来，这个做法现在农民不搞了。引进了一种现代化的，先把种子特别保养，吃偏饭，长得好点才下田。这叫做营养钵。从种棉花一直到采棉花我都干

过。自己做过了几遍。懂也不一定懂，可是却实际地进入到我的生活里面了。我和农民一起住，一起吃，过了两三个月。结交了一个老朋友，我最近还去看望过，他还在那里做农民。我们现在不做农民了，又出来做知识分子了。

经过这一段，从30年代到解放，这一段是我学术生命的第一段。这段时间里面，我写了几本书，都是写我实际调查过的，这种实际调查并不是说我实际参加了农民的生活，我是住在农村里面，是我的姐姐带着我。她在农村里面办了一个缫丝厂，培养蚕，一直把丝缫成线，这是我们江南太湖流域的主要副业。30年代的时候这个副业已经很不景气，卖不起钱了，原因在这里就不讲了。那个时候农民很穷，副业衰败了。我的姐姐从日本学回来这一套新法养蚕，算是有了科学方法了。她跟我一样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比我大七年。一直在那儿养蚕缫丝。我过90岁生日的时候，她送过我一块丝巾，就是她自己亲手做出来的，用丝绵打出来的。她今年97岁了，一直也没有改变过她早年要为农民改良生产的理想，现在的说法叫“科技下乡”，叫农民改良他们传统的养蚕方法，而且进一步叫他们用机器生产，不要再用法制丝了。机器生产日本比我们早，日本的力量把我们比下去了。她办了一个“生产销售合作社”，从生产到加工再到销售。这是从农业到工业，或者说农业的副业到工业，工业再进一步到销售卖到外国去。这是从生产（农业）到出口一条龙，是她发明的。

我的姐姐很能干。我觉得她还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先驱。她很

小（17岁）就到日本去学习，学成回来之后，真正拿来用到农村里面去。她第一批的学生，现在都70多岁了。我在江苏碰到这几个老太太还在农村里面帮助农民搞蚕丝。她的这个传统还会继续下去。

我在燕京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吴文藻先生说，我们的出路，就学术方面讲，社会学一定要走上人类学的道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自己的社会，这是他提出来的。后来我根据他这一见解实际做了，他送我到清华大学去念人类学。有个老师叫史禄国（Shirokogoroff），前年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人不知而不愠》。他虽名气不响，可是他的影响很大。这是我作为他的学生讲的。后来我到苏联去，十几年前的事了。苏联的科学院请我去，碰到他们研究人类学的人，同我说他们现在已经给他恢复了名誉，那个时候他是被斯大林赶出来的。斯大林讲民族问题，还是根据他的一些基本的思想，可是人家都不知道史禄国。我叫他“人不知而不愠”。“不愠”是指心里面不嘀咕，人家不知道我做的好事，不要嘀咕，不要抱怨人家看不起我，最后人家还是会知道的。史禄国就这样在清华呆了几年。没人了解他的本领，他实际上是世界级的一个权威。在人类学方面，他与我的另一位名闻天下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不同，他写的书大得要命，但就是没有人去看它。他是俄国人，用英文写，写出来，说老实话不容易看，我有很多看不懂的，这是理解上的问题，因为他要用自己的概念，不愿用英美传统的概念来表达他自己的意思。所以他用字

很难，创造很多新的名词出来，他的最后一本最重要的书的名字叫做 *Psychol-mental Complex*，两个指心理的词合起来用。现在我把它叫做心态，文化的心态。这是我想出来的。不是指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动作，而是指思想意识，而且把感情都包括在里面。他所说的 *psychol-mental complex* 是一个文化里面最高的一层，不光是指人同人的关系。我在这里讲课，你们坐在那里听，这是人同人的关系。我和你们之间，有着不同的定位，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身份，可是还有一套就是我刚才讲的我的这一套思想，这就是他所说的 *psychol-mental complex*，不是我的讲话，不是我的行动，而是我所讲内容的意义和感情，我很希望你们能听懂我的话，这是我的感情，虽然你们还是听不懂我的话，可是我的心态方面还是有这个意识，要使我的思想转到你们的脑子里面去，这是人类一个最高的活动。就是说我们还有个层次，我管它叫心态，就是指思想、意识、感情、爱好，这一套东西是在人的思想和感情里面存在着而成为影响我们整个文化生活的基础。这一点我还没有写出来，如果再给我十年，我希望能用中国话把它写得更清楚一点。这一点我也不敢说了，因为我还有多少年，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第一段我想讲的，就是我开头讲的我是怎么投入社会学的，就是想要用社会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文化。这一点我讲了很多，文化自觉，也就是史禄国教给我的。这一段我讲完了。

我接下来讲第二段。第二段我进入到一个学术的圈子里面去

了。清华毕业以后我是靠“庚子赔款”把我送出去留学的，所以我一直是跟国耻、跟帝国主义的压迫联系在一起的。当时我还是一个青年，25岁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毕业后我就到广西大瑶山去做调查。这是吴文藻、史禄国都同意的，那是因为要认识中国的实际不那么容易，最好到一个相对不同的社会里去，取得一个参考体系（reference）。你天天这样生活，吃饭拿筷子，不会感觉到有什么特别。从小父母就教我们大家用筷子吃饭，可是用筷子吃饭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有人称之为筷子文化。筷子日本人也用，是东方文化。西方人不懂，要学一学。要懂得中国就要先用筷子吃饭。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没有筷子不行，但是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想到筷子是怎么来的？怎么就开始用筷子了？到现在我也不懂，我们的文化就是从小养成的，不去问为什么这样。我们大家坐在这里听，听我讲，这都有一套老办法，就是传统的办法在那里进入我们的生活。要理解它，孟子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一点大家都听说过，是不是？“知之”就是理解它为什么这样。毛主席则说“问个为什么”，就是要“由之”而“知之”。

平时做事情是不问什么的。为什么可以叫妈妈为“妈妈”，为什么可以在妈妈怀里吃奶？这是不必问的。她当然要给我喂奶啊！这不是个问题，不进入到理性的生活里面去。我们把我们的生活的一套办法，吃饭、吃奶，一直到最深层的“文化大革命”都是视做当然，“文化大革命”到现在没有人讲得清楚，是